

古籍整理 研究丛稿

诸伟奇 著



黄山书社

诸伟奇 著

古籍整理 研究丛稿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整理研究丛稿/诸伟奇著. - 合肥:黄山书社,2007.10

ISBN 978-7-80707-753-4 I.古… II.诸…
III.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IV.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9275号

古籍整理研究丛稿

诸伟奇 著

*

责任编辑 李 媛

责任校对 李 媛 封面设计 国 亮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7 千字 印数 15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07-753-4

定价 26.00 元

凡发现本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 陶新民

伟奇教授嘱我为他的《古籍整理研究丛稿》写篇序言。我很惶恐,但于情于理又无法推脱,只得遵命。

我与伟奇是中学同学。当时他在同学中就以文才显知。可能是安庆人的缘故,受桐城文风影响,天性就爱读书。1968年上山下乡,我们南北分隔,多年无音信相通。1990年我博士毕业来到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才在校园里又遇到他。相谈之后,方知他从农村上来后,先在安徽劳动大学数学系读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后考入安徽大学《汉语大词典》编写组,曾问学于冒效鲁、吴孟复等前辈学者;后来又 to 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是教育部古籍整理讲习班第一期学

员,又师事周祖谟等名家,专业上得到进一步提升。安徽大学在《汉语大词典》编写组的基础上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伟奇亦从此专力于古籍整理工作。由于工作勤奋,很受主持全省古籍整理工作的副省长魏心一同志的看重,被安排为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主任,担负起全省古籍整理的规划整理出版的具体领导和协调工作。我来安大不久,主持中文系行政工作,后来又兼任安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这样,我与伟奇同学又在业务上联系在一起,成为工作中的伙伴。

古籍整理工作是功在千秋的名山事业,其意义无须赘言,但具体干起来,却是辛苦至极,非得坐冷板凳不可,而且这冷板凳不是只坐十年,而是要终生坐下去。伟奇同学是真能坐冷板凳的人。转眼从事这项工作已三十多年了,他不但没有怨言,而是依然兴致盎然。我们每次闲谈,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如今,他把自己这些年来所写的古籍整理方面的文章汇编到一起,我们读了,便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伟奇的这部论丛见证了他在古籍整理方面所走过的道路。这里面有他的思考和汗水。首先,由于他处在省古籍办主任这个位置,有着对全省古籍整理方面的宏观把握和整体思考。如第一篇《新时期安徽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与特点》,说起安徽古籍整理的情况,如数家珍,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他亲身所历,亲手所做。安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诚如伟奇文章中所说的三点:一是建制比较完善,即始终有一个专职实体在从事这项工作;二是能够遵循古籍整理工作的规律、规范办事,不唯钱,不跟风,始终把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三是二十多年没有间断,书一本本出,事一件件做,积少成多,重在持续发展。这三点总结得很好,很实在,正是作者的甘苦之言。

伟奇教授不仅是个很好的行政管理者,而且还是古籍整理的专家。行政工作之外,他一心扑在古籍的整理工作上。他手不释卷,亲自点校、注释、校阅编辑古籍。针对当前整理古籍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在《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再谈旧志整理的几个问题》中强调提高古籍整理质量,“首先,是标点和校勘的质量,尤其是标点”,“标点正确,是古籍整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书稿质量的生命线”,这实在是切中肯綮。

伟奇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对明清古籍,尤其安徽地方古籍流布情况相当熟悉。他注意搜罗线索,辑佚考辨,如《施闰章集外拾遗》、《程瑶田佚稿考述》、《俞正燮及〈俞正燮全集〉的整理》、《〈歙事闲谭〉考述》等文章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示了他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伟奇在编审书稿时,一丝不苟,常能发现别人不易觉察的错误,及时给予更正,对于一些典型事例,加以总结,著成短文,以提醒别人,

如《〈江浙藏书家史略〉摘误》和上述谈《俞正燮全集》整理及旧志标点的文章等。

总之,这部书稿翻阅一遍,感觉如作者为人一贯风格一样:实实在在,一字一句皆落到实处,毫无哗众取宠、客里空的习气。这在当前学界风气普遍浮躁,注水论著充斥泛滥的情况下,尤显难能可贵。

是为序。

目 次

序	陶新民
新时期安徽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与特点	1
在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的发言	7
古籍整理出版之我见	9
在黄山书社务虚会上的发言	14
在《安徽史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17
与《新安晚报》记者丰吉的谈话	22
算事业,须由人做——《安徽古籍丛书》陆续出版	27
《颜氏家训》浅论	34
从谈迁的一篇文章谈起	47
试论有关康熙教案的三个重要文献	57
《不得已》《不得已辩》《历法不得已辨》之书名 及版本	67
《田间诗集》与丁福保批点	74
钱澄之的《所知录》	84
俞正燮及《俞正燮全集》的整理	92
许奉恩与《里乘》	109

《歙事闲谭》考述	118
《杨仁山全集》简介	134
《淮南鸿烈集解》撰事考零	138
《明清小品文解读》前言	146
《小窗幽记》导读	149
《白话智囊》前言	153
《田间诗集》整理说明	159
《钱澄之全集》后记	162
《包世臣全集》后记	166
《(嘉庆)庐州府志》校点说明	168
《镜花缘》校点前言	175
《乾隆下江南》校点说明	180
《佛教三字经》前言	183
《人间词话》评注本前言	186
《庄子诠诂》校点本前言	192
《近代皖人话国是》总序	195
《刘文典全集》前言	198
《庄子补正》校点说明	209
《说苑斟补》校点说明	212
《大唐西域记简端记》辑校说明	215
刘文典诗文辑校说明	217
刘文典译本《进化与人生》略说	218
刘文典译本《生命之不可思议》略说	221
刘文典译本《进化论讲话》略说	223
《刘文典全集》后记	225

《简明古籍整理辞典》前言	231
《简明古籍整理辞典》凡例	234
施闰章集外拾遗	236
程瑶田佚稿考述	248
《刘铭传文集》补遗	269
《刘文典全集》佚诗考补	272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280
再谈旧志整理的几个问题	290
《辞海》《辞源》人物条释义失误举例	303
《夜雨秋灯录》点校疑误	307
《江浙藏书家史略》摘误	311
父子误为一人	315
也谈“吏部文章二百年”	316
古籍整理的可喜成果	318
编纂《全宋诗》的一项基础工程	321
一部鲜为人知的类书——《古事比》	325
皖人古籍简介四种	328
谈谈《杨乃武与小白菜》	332
书城掌故 嘉惠学林	335
多出可站住的书	338
后 记	341

新时期安徽古籍整理 出版的成就与特点

安徽地处我国南北之交,学术兼擅南北之长,数千年来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据不完全统计,流传古籍达一万七千余种,著者六千六百余人,现有目有书、作者可考者即达四千余种,古籍藏量居全国前列。在对前代典籍的整理方面,亦代不乏人。晚清以还,安徽南北郡邑即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先哲遗书》诸刻。1931年,在省内皖籍学者名流的精心筹划和通力合作下,又有《安徽丛书》的编刊,后因抗战爆发,只出了六期(辑)而被迫中断,盛业未竟,论者惜之。1949年后的二十年,因为全国古籍整理的布局及其它方面的原因,作为省市层面的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处于停顿和空白状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三十七号文件,明确指

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81]37号文件下发以来的二十六年，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空前繁荣的二十六年，也是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成果丰硕、持续发展的二十六年。

1984年，中共安徽省委建立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当时的省人大副主任、原副省长魏心一任组长，小组成员包括省新闻出版局、教育厅、文化厅、财政厅和社科院等单位。同年，黄山书社成立，黄山书社主要承担本省古籍的出版任务。此后，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从此，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队伍建设和整理出版方面掀开了崭新的一页。1989年经省政府批准，小组易名为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简称“古委会”），魏心一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出版局和安徽大学的领导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其他成员单位未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员七名，列入事业编制，处理古委会日常工作。同年，制定了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长期计划，组建了《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简称“编委会”）。当时编委会主任是吴孟复先生，编委会主要负责全省古籍整理规划的制定和年度出版计划中书稿的审订。安徽省委、省政府对古籍整理这一块工作是重视的。这些年，省委、省政府专门为古籍整理出版颁发的文件（包括批复、会议纪要）就有十个，文件中明确了古籍办的建制、管理、人员编制、工作内容和经费渠道，并向各市、县人民政府和省直有关单位强调了古籍整理工作的

重要性,要求大家重视、支持这项工作。与经济发达的省市相比,安徽并不很富裕,但省财政厅每年除古籍办的办公经费外,对古籍图书的出版有专项补贴,列入财政预决算,根据每年的出书情况,补贴额度不等,平均在 20 ~ 30 万之间。这一点非常重要,是我们这些年持续出书的重要保证。

根据省古委会研究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徽省古籍整理的主体工作是编纂出版《安徽古籍丛书》。《安徽古籍丛书》所收为历代皖人著作。这里的“皖人”,在地域上,一般以现行区划为据;在时间上,一般以辛亥革命以前为限。所谓“一般”,即不搞“一刀切”。地域上,既指本籍的,也含寄籍的,如程廷祚祖籍歙县,寄籍江宁;既从现行区划,也兼顾当时区划,如南宋婺源人朱熹、清代婺源人齐学裘等。在时间上,不是将所有“古籍”都定死在 1911 年前,而是要根据作者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和作品的内容性质而定。这套丛书既重视整理出版像朱熹、方以智、戴震、吴汝纶这样的大家名家之作,也重视那些在全国范围内可能名声不显,但在某一地域、某一方面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如吴肃公、朱书、方孝标、赵吉士、胡麋善、汪宗沂等;有些在当时就是著名人物或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某种(主要是政治)原因,尚不被当今学术界普遍知晓,更缺乏应有的评价和研究,如明清之际的吴应箕、钱澄之,清末的杨文会、萧穆、马其昶、姚永朴等,他们的著作更是整理的重点。这套丛书尤其重视稿本、精抄本、名校本等稀见书的搜集、整理,如因清廷文字狱而长期被禁毁的著作,等等,从而使先辈心血不致沦亡。另外,对那些属于安徽古籍范畴,然依例又不能列入《安徽古籍丛书》的选题,我们另辟《安徽古籍丛书附辑》,如已出版的《姚莹年谱》、《弢翁藏书年

谱》、《〈明实录〉安徽经济史料类编》等。

《安徽古籍丛书》在整理方式上,包括校点、注释、影印、资料汇编等,但主要是校点(即校勘和标点),少数书采用简要的注释;多数书用繁体字,也有些书用简体字,主要根据书的内容而定;全套丛书一律竖排。在书稿质量要求上,首先是选好底本和校本,校勘和校记的写法要符合规范;标点力求准确,尤其注重引号、专名号和书名号的标打,这些都是古籍标点的难点,处理好这些难点,既便利当今读者阅读,也显示当代古籍整理的质量、水平和作用;要写出有一定水平的前言或校点说明;要有相应的附录(包括原作者传记、前人序跋等资料),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斯人斯书;提倡编制索引,以方便读者研究和文献检索。在出版管理上,凡列入《安徽古籍丛书》的图书,除责任编辑外,还聘请专家担任审订人;鉴于古籍图书特点和现有人员条件,我们提倡编校合一,每部书稿至少三个校次,有的书稿甚至是五校、六校或更多校次;重点书和难度大的书都要安排版前审读;印制上,随着经费情况的逐年改善,在用纸、用料、装帧等方面也逐年讲究,更加注重工艺质量。这些年,提高古籍图书的质量,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主心轴,尽管客观上未必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主观上一直要求在整理、出版等各个环节上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新中国古籍整理最为人称道的是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书,如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五史;而当下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一些所谓古籍整理图书,不讲版本,不讲校勘,标点又错误百出。其实,标点正确是古籍整理最基本的要求,是书稿质量的生命线,标点不过关的书不如不出版。

迄今为止,《安徽古籍丛书》(连附辑)已出版了81种136

册 5000 万字,其中有三十多种图书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和安徽图书奖等奖项,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赞扬和鼓励。目前,另有《方以智全书》、《楼山堂集》(吴应箕撰)、《定山堂集》(龚鼎孳撰)、《一木堂诗集》(黄生撰)、《螽山集》(方文撰)、《方孝标文集》、《七颂堂集》(刘体仁撰)、《寄园寄所寄》(赵吉士撰)、《凌廷堪全集》、《德风亭集》(王贞仪撰)、《河海昆仑录》(裴景福撰)等书稿在整理和编刊中。

当然,谈到安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不仅仅是《安徽古籍丛书》,还应包括《丛书》以外的其它安徽古籍和由我省专家学者整理的安徽典籍以外的古籍。这方面的成果也是十分突出的,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集注》、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编》、黄德宽等的《古文字谱系疏证》、陈秉新的《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和安徽科技出版社的《新安医籍丛刊》、黄山书社的《历代词纪事汇评》《新编中国戏曲论著集成》,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等古籍整理巨制。

从全国多数省市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状况来看,如果说我省古籍整理工作有什么特点的话,恐怕有这样三点:一是建制比较完善,即始终有一个专职实体在从事这项工作;二是能够遵循古籍整理工作的规律、规范办事,不唯钱,不跟风,始终把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三是二十多年没有间断,书一本本出,事一件件做,积少成多,重在持续发展。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深知,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先进省市相比,我省古籍整理起步较晚,出书总量较少,一些

书整理出版周期过长,如《钱澄之全集》(7卷)、《俞正燮全集》(3卷)、《程瑶田全集》(3卷)从立项到出版都在十年以上。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无论是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还是整理方式的优化、整理方法的创新、研究内容的深化和拓展,都需要一代代中国古籍整理人的不懈努力。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10期)

在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会议上的发言

(1992年5月)

古籍整理的质量近年来有所下降,这与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材缺乏有很大关系。古籍整理像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古籍整理界人心思动,而且有些高校科研单位不把古籍整理算作研究成果,一些文史研究工作者功力不够,难以胜任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要注重人材的培养,保持古籍整理的连续性。

对古籍、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研究概念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特别是古籍的下限,应该明确。如果30年代的著述都算古籍,那样连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也可算作古籍了。

《规划》(指《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出版者待定的有4项,整理者待定的有28项,整理者、出版者全部待定的有42项。这些如何落实?

应当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如我们安徽省就成立了古籍整